

艰辛的探索：邓小平
1952-1976年的
JIANXIN DE TANSUO:
1952—1976 NIAN DE
DENGXIAOPING
高志中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艰辛的探索：邓小平
1952-1976年的
JIANXIN DE TANSUO:
1952-1976 NIAN DE
DENGXIAOPING
高志中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艰辛的探索：1952—1976 年的邓小平/高志中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211-06979-8

I. ①艰… II. ①高…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①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9871 号

艰辛的探索：1952—1976 年的邓小平

JIANXIN DE TANSUO: 1952—1976 NIAN DE DENGXIAOPING

作 者：高志中

责任编辑：林俊杰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微 博：<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1.5

字 数：32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979-8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一、到中央工作/001

1. 奉令进京/001
2. 为共和国理财/009
3. 维护党的团结/017
4. 就任中央秘书长/024

二、八大前后/031

1. 筹备八大/031
2. 修改党章的报告/039
3. 当选总书记/043
4. 出访苏联/047
5. 贯彻八大路线/053

三、从整风到“反右倾”/067

1. 整风运动/067
2. “我就有点着急”/072
3. 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081
4. 在“大跃进”运动中（一）/084
5. 在“大跃进”运动中（二）/093
6. 参与初步纠“左”/098
7. 心系西藏的稳定与发展/105
8. 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109

四、纠“左”的努力/115

1.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115
2. 促成“工业七十条”/129
3. 在七千人大会上/143
4. 推动大规模甄别平反 151/
5. 支持包产到户/157

五、中苏论战与三线建设/164

1. 维护独立自主（一）/164
2. 维护独立自主（二）/174
3. 西北、东北之行/187
4. 关心三线建设/191
5. 暴风雨的前夜/198

六、被错误打倒/210

1. 防止失控的努力/210
2. 撤销工作组/218
3. 被错误打倒/223
4. 艰难时日/231

七、从下放到复出/239

1. 下放江西/239
2. 劳动生活/242
3. 出现转机/246
4. 重返中央/252
5. 出席特别联大/260
6. “人才难得”/265

八、主持全面整顿/275

1. 以铁路为突破口/275
2. 解决钢铁问题/282
3. 排除干扰/285
4. 全面整顿/293
5. 三个重要文件/303

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子/312

1. 对待“文革”不“转弯”/312
2. “反击右倾翻案风”/317
3. 再次被错误打倒/328

主要参考文献/338

一、到中央工作

1. 奉令进京

1952年7月1日，四川人民企盼已久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此时，邓小平主政西南已有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了。

到这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两年又十个月。新中国面临的形势，与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土地改革任务，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固；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彻底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和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目标即将实现；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

这一切充分表明，我国已初步具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考虑到全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充实和加强党与政府的中央领导机关，决定从各中央局和各大行政区调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

1952年6月20日，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并指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

建立党中央的机构。”^①

这年上半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花了很大的精力领导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协助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邓小平是最恰当的人选。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提出他准备“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八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②毛泽东在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7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同意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望小平将西南的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③

与此同时，刘少奇又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由他们两人主持起草《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杨尚昆和安子文很快就将《意见》起草出来了。《意见》提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了这个意见，在转呈毛泽东时，他附信说明：“整个方案自须待九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④

8月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转呈的这份意见上，作了如下批示：

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

（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①

邓小平是顾全大局、组织观念极强的人。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后，立即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成为中共中央要调的五个中央局书记中最早来北京的人。随后，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也相继调到中央工作。

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8月10日，周恩来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的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鉴于政务院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应予改组；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组成人员，除原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员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等人，由周恩来任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8月13日，毛泽东同意了 this 报告。

这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已有了初步的眉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商谈有关问题。临行前，即8月13日，周恩来同刚到任的邓小平详细谈了政务院所主管的各项工作和主要任务。在随后举行的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②

不久，邓小平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4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指出：鉴于在过去国家经济恢复时期，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重点，因为当时实际需要和人力限制等原因，曾经较多地放在财政、金融、贸易、铁道和水利等部门，而对于其他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一般地未得予以同等的注意；同时，鉴于财委目前所属单位，较过去已经大为增多，而在财政、金融、内外贸易方面的领导任务今后又将日益繁重，因之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领导隶属关系，应暂作如下的调整，以利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进行：

（一）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

（二）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合作总社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领导，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

（四）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划委员会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资储备局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

邓小平从此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1月，政务院通过并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等，规定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制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采取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的方法，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①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强调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使得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1953年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3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状况。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①1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天津市委分别报送了《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报告》和《新税制公布后的市场物价情况和意见》，反映实行新税制后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群众议论纷纷。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卒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① 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①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批评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采取了补救措施，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中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①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个人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还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来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①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2. 为共和国理财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薄一波提出要辞去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对邓小平的任命。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邓小平就任财政部长后不久，即参与了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策。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国家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可是就在这一年，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1952年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44.8%。但是，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自给性消耗也在增多。随着工业建设步伐的加快，城镇人口骤增，1953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了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万人。几年来，新中国工业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作物的面积也迅速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的农民，都需要国家供应他们粮食。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到了1亿人。

当时，粮食允许自由买卖。农民除了交纳公粮（农业税）外，余粮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每年私商收购的粮食要占商品粮的30%左右。私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进行粮食投机，或抢购粮食，或囤积居奇，造成粮食市场的不稳定，致使粮食供需矛盾更加尖锐。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进入1953年，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并且日趋严重。

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粮食问题，1953年10月2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首先作了报告。陈云说，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如不采取措施，会更加严重。他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情况作了分析：一是收购少，销售多；二是已有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和乡村之间，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混乱，粮多的地方开始抬价；三是全国规定供应京津的粮食23亿斤，现在只能供应10亿斤，可是仅过3个月就卖了5亿多斤；四是原定东北调粮42亿斤，因为受灾，只能上调14亿斤，缺口很大。总之，粮食紊乱时间将提早到来，范围也会扩大，从乡村一直蔓延到大城市。

陈云指出：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与这四种关系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是，农村实行征购，城市实行配售，严

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

毛泽东在听取陈云的报告后，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征粮的布置推迟一个月。当天，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及财委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决定于10月10日至12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指出：“在这个会议上，将对粮食问题作通盘的考虑，并拟实行粮食征购的政策。因此，今年征收公粮的时间，必须略为推迟，等到全国粮食会议作出新的决定之后，与粮食征购工作同时进行，较为有利。”^①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陈云在讲话中详细地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并对八种可能采用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逐一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只有又征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行。邓小平在会上也讲了话，着重论述了粮食统购统销与巩固工农联盟、与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说：对粮食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所有粮食的买卖集中国家管理的政策必须确定。这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稳定物价，有利于经济建设。^②

10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粮食会议的有关问题。10月13日，邓小平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再次作了讲话，指出：昨天晚上，毛主席强调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就是说，把总路线讲明白，才能使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赞成统购统销，并执行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今年3月以来，毛主席就要我们全党了解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要经常注意到怎样去增加我们国家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完成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统购统销，实际上就使农村的资本主义受到了很大限制。要使全党所有干部懂得，这次粮食会议，不只是解决了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8页。

得，还解决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就是怎样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纳入互助合作的道路，纳入社会主义道路。要对农民讲社会主义的好处，告诉他们要想真正使生活好起来，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总的来说，就是要在总路线这个灯塔的照耀下前进，来考虑问题。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冒资本主义尖的积极性，一种是冒社会主义尖的积极性。我们应该诱导农民冒社会主义尖的积极性，走互助合作的道路。^①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经全国粮食会议讨论、邓小平负责起草并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

（二）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农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

（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四）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

《决议》指出：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

11月19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向全国公布。由此，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被确定下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缓解粮食的紧张情况，稳定物价，保证经济建设必需的粮油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